

馮翰文、許森訪問

日期：2008年12月5日

時間：上午9:30至11:40

地點：馮翰文先生家中

受訪者：馮翰文先生(馮)、許森先生(許)

訪問者：梁操雅博士(梁)、陳嘉欣小姐(陳)、黃浩然先生(黃)

梁：...一直以來大家的貢獻都很大，所以希望藉着這個時刻寫一點東西和做一些事。要做什麼事呢？除了寫一些書籍以茲記錄和感謝各位的貢獻以外，亦希望可以成立一所博物館，教育的博物館。於這件事上我希望可以一盡棉力，盡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片段。最近有幸認識了許老師(註：許森)，由許老師的口中得知從馮老師(註：馮翰文)身上可以獲取更多資料，於是我便很不客氣地麻煩許老師相約馮老師閒談一下，學習一番。

許：馮老師看着我們長大的。

梁：雖然我的年紀也不少，但在兩位面前也只是一個晚輩，所以想知道一下當年的大致情況。

馮：別這樣說。

梁：其實我們都想知道關於鄉師的情況，當時你們的生活、一些故事、當時教育的情況和你們的看法、環境如何。我想這些也是珍貴的資料。當然，現在既缺乏一些文獻的記載，借助你們口中所述，亦會變得親切得多。所以希望我們可以在這些方面談一下。

馮：好啊。

梁：我想今天大家先隨意談談，看看馮老師能給我們怎樣的經驗，然後我們再找一些資料，另外再找機會詳談。

馮：沒問題。關於鄉師的資料，許森先生也十分清楚的。

梁：兩位也是，千萬別客氣。

許：馮老師差不多由開校一直工作至學校結束，我卻只讀了兩年的光景。

馮：關於鄉師比較詳細的情形，我想從前 貴學院方博士（註：方駿），也寫了一本很詳細的書籍。除了方駿博士以外，今年（2008）年頭的羅教授（註：羅慧燕）也和我訪談過。我有一篇簡單的文章，題為「我的故事」，傳真了給羅教授，能夠在她那處拿到，那文章會談得比較詳細。我有一個印象，就是口頭歷史比較流行，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像我那樣的講者年紀較大，很多事情會遺忘，有時說話會像胡言亂語那般。好像羅教授把錄音的 Transcript 給我看，我一看便覺得很失禮，因為不知道在說什麼，所以結果便寫了一篇文章傳真給她。所以這裡是一個問題。

說回來，假如關於鄉師的事，許森先生或許可以說不少，傳真給羅教授的「我的故事」也說了不少，而且鄭啓濤，鄉師同學會的主席，在鄉師金禧和鑽禧也出版了特刊，裡面亦詳細記載了鄉師的歷史。我想參考那些資料比我在這裡說，掛一漏萬為好。

梁：多謝馮老師的提點。其實我們都希望在這一點上和羅教授有所不同。就是當年鄉師的所在、附近的環境，或者當年的文件會否還存在呢？

馮：有。鄉師辦了八屆，有六次畢業典禮。在辦理時，校長黃國芳先生在每一個畢業典禮也會做一份報告。黃校長是香港的老教育家，在就讀皇仁時已經參加了 Pupil Teacher，即是教員學徒制，是一個 Article Pupil。後來香港大學辦教育系時，黃校長便由皇仁轉到香港大學教育系讀了 4 年。香港大學教育系在戰前和戰後是截然不同的。戰前它是屬於文學院的一個學系，戰後雖然也是一個學系，但要先在香港大學就讀，再讀教育學位。

梁：即是學位後課程？

馮：教育文憑。黃校長真正是戰前的教育系畢業。畢業以後在香港教育司署服務。這個時候很多人會混淆...

梁：請讓我岔開話題一下。那個時候大約是什麼年份呢？

許：戰前的時候...

馮：這個時候我想是戰前...的 10 年。

梁：即是 1930 年左右的時間...

馮：對，香港戰前是 1941 年，十年以前大約是 1930 年代...可以說是 1925 年到 1940 年那段時間吧。

許：他在漢師(註：漢文師範學校)教過書的。

馮：對。黃校長是在香港最先的漢文師範教育學校當校長，當了一段時間以後，香港政府便辦了漢文中學。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當年合資格的教師，都全被漢文師範學校聘請了。當時的教師都是老一輩的，是前清的太史、舉人、秀才等，漢文中學辦的時候沒法子請到老師，那怎麼辦呢？唯有客家佔地主了，把漢文師範撥入漢文中學，當作是其中一部分，成了漢文中學的師範部。

梁：即是幫它培訓一些教師出來。

馮：對了。那麼黃校長便成為了師範部的主任。

梁：即是黃校長從大學畢業以後，便到了漢文師範當校長，接著便成了漢文師範部的主任，培訓中學老師。

馮：到了後來的一個時期，羅富國師範成立，黃校長亦有在那裡任教。到了戰後，開辦了鄉村師範專科學校。開辦這學校的情形是，新界原本有一所在大埔，叫做埔師，即大埔師範學校。埔師原本的學校性質，如果拿中國的教育制度來比較的話，就等於初級師範。

許：或者叫簡易師範。

梁：當時的學制是怎樣的呢？譬如時間是...

馮：它的程度說起來大概是初中畢業...

梁：初中畢業就可以入學？

許：等於初中畢業，小學畢業就可以入學。

馮：一直就是這樣的情形，一直辦至香港淪陷，即是 1941 年末。全港的學校也幾乎全部停頓。埔師和羅富國也停頓了。到了戰後...

梁：對不起，我想問一個問題...剛才說收生...

許：小學畢業，讀 4 年，畢業以後教小學...

梁：但收生的時候，學生的年齡，其實以現在的想法，也是很年輕的，會不會？

馮：年紀很輕的。

許：十三四歲左右，畢業時便十七八歲，便可以教書了。

馮：這一個問題，我們局外人便可以這樣看。但如果找當時的校長陳本照先生，他從埔師成立便當校長至埔師結束。對他來說，他會說「我就唔清楚嘞」。他認為埔師的程度是很高的，這很奇怪，也很難說。因為陳本照校長是漢師畢業的，但當時有另一種很妙的制度：當時任教漢師的還有幾位太史公，黃國芳先生是港大畢業，也是皇仁書院的 Pupil Teacher，然後去當校長。所以他是正統香港大學出身。

梁：天子門生。

馮：校長便歸他當。那些太史、秀才因為不是香港訓練出來，但又要借助他們，不能不請他們。但真正掌權的便要是本地訓練出來，好像黃國芳先生那樣的人才行。陳本照先生是漢師畢業的，但當時除了漢師畢業以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制度：就是香港政府給他們一些津貼，要他們跟某一個太史公進修。這不是一個正式的制度，但有這一種辦法。我記得在漢師畢業的有兩三個，陳本照先生是其中一個，接受了政府的津貼，跟太史公特別進修。因此，雖然他沒有正式的資格，但又比漢師畢業的同學高了一層。我想最多只有三人。

許：是不是有一個陳袞？

馮：陳袞不是。

梁：這個當時，好像港大中文系也有一個賴際熙太史當系主任。

許：還有一個歐大典。

梁：你說起這個狀況，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是一個流行的現象，清末的太史在香港...

馮：所以說起這些事，也像白頭宮女說玄宗，越說越長。話說回頭，埔師辦到 1941 日軍佔領香港為止，便停頓了。停頓以後，1945 年年末日本投降，英國派海軍到香港重新保持她的管治權，那個時期叫軍政時期。大抵時 1945

年末到 46 年 4 月左右。

許：那個總督叫夏慤，海軍來的。

馮： Vice Admiral 。

許：現在那家夏慤療養院。

梁：夏慤道也是。

馮： Admiral Harcourt 回來接收香港。有一段時間，1945 年末到 1946 年中，是軍政時期。然後就恢復了民政。在淪陷的時候，楊慕琦總督 Sir Mark Young，大概是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間由英國來香港，接任羅富國當總督。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

許：倒靚總督，最倒靚是他了。

馮：到了日本進攻香港時，當然英軍和加拿大義勇軍曾作出一番抵抗，但抵抗不了，於是楊慕琦總督便負責向日本軍隊投降。楊慕琦總督便成了戰俘，被關進了中國東三省。

許：日本集中營。

馮：到了日本投降，楊慕琦總督當然被釋放出來，英國政府因為他只當了 1 年總督，覺得就此了事不太妥當，於是叫他回香港仍舊當總督，但任期只限 1 年。普通總督通常是 4 年一任，但他戰前一年，戰後一年。

許：又坐了 3 年監。

馮：又話說回鄉師，楊慕琦總督回港以後，那時真正是百廢待舉，周圍滿目瘡痍。他回港後有一種看法，就是香港的市區，尤其是香港島面積很小，即使加上九龍半島的面積也很小。只有新界的地方才夠大。他有這樣的概念，假如香港要發展，限於面積關係，香港本島和九龍半島這些割讓給英國的地方的範圍很小，只有繼續租借新界。因為地方大，潛力也很大，非要發展新界不可。要發展新界，首先要發展新界的教育。發展新界的教育，便先要造就新界的師資。

他也知道戰前有埔師的存在，但覺得埔師只是簡易師範或初級師範，他們畢

業的程度只有初中左右的水平，因此不能負擔發展新界教育的責任。於是他便放棄了埔師，不讓它復校，另外辦一家師範學校。這一家新的師範學校要和羅富國師範學校一樣，都是兩年制，收高中畢業的學生。照香港本身的制度，這些學生都有 **School Leaving** 的資格，然後才可以就讀。換言之，要辦一家新的師範學校，它要和羅富國師範學校一樣的資格，都是受政府津貼，都是修業兩年。

許：兩年全日制。

馮：不過，當時百廢待舉，想找校舍也找不到，更談不上建新校舍。於是楊慕琦總督便拍心口，與教育司及新界視學官...那個時候的教育司是柳惠露，又叫羅威爾。新界的視學官是尹耀聲先生，是華人來的。

許：他是駝背的。劍橋畢業，學化學的。

馮：他留學英國時學騎馬跌倒，所以變成駝背。楊慕琦總督交帶羅威爾要辦一家和羅富國同樣程度的師範學校。新界的地方以中國人為主，因此發展新界的教育以中文比英文為優先。因此先辦中文部而沒有英文部，羅富國則有中英文部。羅富國的中文部和英文部各收 25 名學生，鄉師初辦時的中文部亦收 25 名學生。

有樣特別的東西，就是因為新界地方大，如果像羅富國那樣的走學制，就會很不方便。因此凡是鄉師的學生都要寄宿，但政府不收宿費。

梁：那麼當時設在哪裡呢？

許：當時楊慕琦總督很闊綽，把總督別墅借出來。

馮：剛才說到找現有校舍很困難，更談不上建新校舍。因此楊慕琦總督唯一的辦法，也是最速成的方法，便是說：「我不嘆世界了。」他借出粉嶺的別墅給香港政府教育司，由教育司以別墅作臨時校開辦鄉師。

許：即是現在高爾夫球會，上水金錢村那裡。

馮：名稱上也有很多改變。

許：英文名稱沒變過。

馮：英文用 Rural Training College。但中文便成問題了。因為當時鄉師沒有一個正式的譯名，開辦之時只是叫「鄉村師範學校」，有些人會加「官立」二字，變成「官立鄉村師範學校」。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港督的別墅叫「港督粉嶺別墅」，但實際卻在上水的金錢村範圍內。

剛剛開辦時，當然只有一年級的學生，也沒有辦法按原來規定，取錄中國學制中的高中畢業、香港學制的 School Leaving。School Leaving 即是未達到 Matriculation 的程度，只是中學畢業。因為香港的制度是，當完成中學後，假如不想升讀大學，教育便告一段落，所以有一個 School Leaving 的資格。假如想入讀大學，便要多讀兩年預科，考取一個 Matriculation，然後才可入讀香港的大學。當時只有香港大學一家，並沒有其他選擇。

許：說一個笑話。當年羅富國全名是羅富國師範學院，但黃（註：黃國芳）校長很討厭「學院」這稱呼。他說：「跳舞的也叫學院。」因為當年很多跳舞學院，黃校長不喜歡，堅持要叫師範學校。黃校長的性格比較執拗。

梁：正如馮老師提到五六十年代的學制，我認識的老師很多都是讀完中學便進入師範，後來再補考 Matriculation 入讀大學。他們可能是自修的。

許：對。讀完師範再讀港大。我認識一個朋友廖慶齊都是這樣的。先讀羅富國再自修，後來入讀港大。

馮：說到這裡，鄉師在港督粉嶺別墅開辦，只有一班，因為是戰後的第一班，所以也會取錄一些學歷在規定以下的學生。因此第一年的程度會較參差。收生只要足夠 25 名，有男有女便行，放寬了收生的資格。

還有就是教師方面。開課的時候連校長在內只有兩名教師。校長是黃國芳先生，老師是教農科的陳幼直先生。為什麼只有兩名老師呢？最初也有很多解釋。一、因為在新界，學校有宿生，所以除了校長以外，老師也要留宿管理學生。這是很令人難做的條件。校長因為與香港政府簽合約時訂明，可以帶家眷同住。黃校長有一位太太、三名女兒，便一家人住在學校。第二，由新界乘車往市區，全家人有一種特權，可以免費乘火車。但教員也沒有這種優待。

許：那時在上水，由學校行到火車站大約要半小時。

馮：所以以這些條件很難找教員。一來在新界上班和寄宿，二來家眷要另外找地方住。

許：當年的人很怕入新界。

馮：當年的新界是窮鄉僻壤，生活水準很低。

許：我初出來教書時，馮老師教導我，一定要穿長袖衣服，因為蚊患很嚴重。

馮：那時的蚊患很嚴重。曾經試過香港軍部找印度兵以 DDT 藥水在港督別墅洗地，連前後的森林也要洗。我們一定要帶蚊帳進去

因此聘請教員很困難。另外就是當年教員的薪水很低。譬如羅富國的畢業生，由政府聘請的是 100 元起薪。香港大學畢業的 150 元。試用最低兩年，試用期滿後便成了正式教員 Permanent Establishment。每一年的「年功加俸」(Increment) 羅富國一年 10 元，港大一年 15 元。私人聘請的人工另議。

當初我的觀念，是因為上述的兩個因素導致聘請教員困難。但漸漸隨著鄉師歷史研究的發展，我才悟到一個道理。

黃校長作為一個老教育界，既在羅富國當過講師，又在漢文師範當校長、漢文中學當師範部主任，也曾當新界視學，亦是在香港大學畢業，是很有經驗的。但因為有這樣的資歷，因此香港的教師圈子對他的認識很深，很多人也是他的同事。鄉師請不到教員的其中一因，是因為教育界都知道他的脾氣、習性。他接手當鄉師校長時，沒有什麼人願意當教員。

因此，鄉師這麼多年來都是請一些「飛來螞」，不能聘請由羅富國或香港大學畢業的教員。總之，在香港教育界之中老資格的人，沒有一個人願意和他合作。

許：我想補充一點。當年鄉師是沒有電話的，連和外面聯絡也不行。

馮：黃校長辦鄉師時想利用教育司的權力，把官校的老師調任鄉師，但沒有人願意。有些人更說，如果你把我調任鄉師，便情願辭職不幹。實際上，當年內地教員的薪水比香港的還要高，所以打仗時不少教師走難回內地，也是做回教師的。戰後他們理應復員回港，但有些人因為內地薪水較高而不回港。好像羅富國有幾位，像阮雁鳴先生等，當初也不肯回來。

梁：其實二十五名學生應該有多少位老師？

馮：問題不是人數多少。因為人數少，但科目卻很多。鄉師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不設選修科。羅富國的術科是可以選修的，但黃校長決定所有都是必修科。但黃校長也有他的理由，因為當鄉村的教員，很多時候一家小學不論有多少班也好，因為學生少而不能多請教員。很多時一個教員，既擔任校長的角色，也擔任教員，甚至是校工的角色。教多少班也好，也是複式教學，一腳踢。因此必定要所有科目都有認識。

許：當年黃校長很注重農科，經常要我們耕田。要我們養豬。

馮：所以鄉師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科。但有一個問題：科目多但學生少，和羅富國和以後的葛師都不同。例如葛師，因為學生多，所以每個科目都至少有兩個講師。但鄉師卻不行，一個老師要兼教數科。最初的時候，黃校長要兼教教育、英文、教學參觀、教學實習等。

許：黃校長教教學法，馮老師則教教學心理，還有教中文、歷史、地理（補註：還有英文、教學參觀、教學實習）。

馮：教學法、教學法就是教育科，由黃校長負責。他是一個「光頭校長」，因為這 8 年間黃校長從來沒有書記幫手。他亦從沒有將這些責任分派，例如誰人負責訓育，教員就是教員，校長就是校長。

梁：那麼宿生呢？都是由校長看管的？

許：都已經長大了，不用多看管的。

馮：幾乎都是他。不過要老師住宿，但很少驚動我們。

許：你們非在那裡住不可，不然翌朝怎麼趕回來上課？

馮：最初黃校長負責很多科目，還有另一個陳幼直先生，是黃校長的街坊街里，是熟人來的。他是嶺南大學農科畢業，所以找了他來。這是私人關係。然後我就進鄉師。

梁：你是哪一年上任？

馮：1946 年，比開課遲了一個月。九月開課，1946 年 10 月 6 日左右我便任教。我也是因為私人關係而進鄉師任教。因為打仗時黃校長入桂林，在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當年走難，培正培道因為屬同一教會而沒法分開，在粵北曲江以

上有一間培正培道聯合中學。那中學是培正的底，主持的人和教員多是培正的人；桂林四會街也有一家培正培道聯合中學，主持的校長和教員多是培道的。黃校長由香港走到桂林，在培聯教英文。我也是走難到桂林，在那裡教中文。於是我們便成了同事。那家學校有宿舍的，每一個教員獲分配一個床位，一間房有二至三個床位，而我和黃校長編在一間房。雖然我們不是經常在那裡睡，因為各有家眷。間中會回校住宿，間中又回家住宿。

許：黃校長好像有在上海大夏大學教過？

馮：以我所知沒有。

許：我們在桂林是同事。他任教的時間比較長，我只教了一年，然後過了曲江。因此我們有一年同事之誼。還有，當年桂林有一家桂林師範學院，是大學的程度，院長叫林勵儒。林院長戰前在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時教過我的師範教育，因此有師生之誼。在桂林時剛巧我要找地方住，他又因新屋落成而要退租，於是讓了給我，這也是因為師生之誼。他的師範學院剛有一位英文教師要去重慶而要辭職。當時的人流動性很大，原本的英文教師其實本來也不是教書的，但因走難而要工作，或許在重慶找到更好的工作便離去吧。於是院長便要找新人接替。其實當時找人接替並非太困難，不過林院長因為與我熟稔，便問我有沒有人介紹。我想，黃校長一來是教英文的，二來走難的時候，學校也不會管教員是否兼職，如果找到兼任的位置也沒所謂的。於是我便介紹黃校長到桂林師範教英文，我走了以後黃校長仍然在桂林師範任教。到了桂林失陷，黃校長走難的情況我便不清楚了。

總之我和黃校長就有這樣的關係。

許：補充一句，當年教農科的，全部都是嶺南大學畢業的。因為港大沒有農科。

馮：話說回鄉師。其實在戰後我應該是回廣州的，因為我出生、受教育都是在廣州。當年主修是教育，副修是心理，在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讀了 4 年。

因為中大（註：中山大學）是母校，畢業以後在母校的中學也教了 3 年。我也可以回嶺南。未打完仗的時候，我由桂林走到曲江，曲江失陷時又走到澳門。在澳門教過協和中學，又辦過嶺南大學分教處。抗戰勝利後，我在澳門見到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做得一塌糊塗，幾乎都不是公事公辦，只有政客在爭權奪利。我記得首先中山縣政府派了一個特派員來接收肅貪，然後廣東省政府也派人來，廣東第四方面軍也派人來，軍政部、外交部也派人來。大家也在爭，結果葡萄牙政府要派衝鋒隊來鎮壓。同時，我也知道東北接收的

情形，蘇聯把日軍的軍械全交給紅軍，看來國共一定會有內戰。因此我覺得沒有必要回內地，反正廣州失的時候我也到過澳門避難，也試過來香港做事。因為澳面局面細，香港比較大一點，所以嘗試在香港找份工作，靜觀待變。因為走難走過很多地方，家也散了，如果要再走難便吃不消了。因此不如在香港找機會，較為上算。

回到香港，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黃校長，他和我說遲些會入新界辦鄉村師範學校，如果有機會不如一起辦，像在桂林時大家風雨連床打牙較吧。於是我們便交換了通訊地址。

實際上當時黃校長已經找了另一個教員，湊巧也是培正培道的同事。那位是李良棟先生，也是我在中大的同學，但他主修地理。其實他已經約好了李先生，着他鄉師辦好時便來幫手。可見黃校長也知道在香港找教育界的同事很困難，因此老早便找李良棟。當時是在 1946 年的暑假前說的，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大陸的學校在暑假初便已經決定下一學年的教席，所以聘書都是在暑假前發出的。黃校長依照香港的辦法，尤其是戰後是隨便到極，與李先生說好了便算，等到 8 月底鄉師開學便寫信叫李先生到來。但在李先生的立場，在暑假到來也沒有任何消息，於是他另外在內地找一份工作。所以在 8 月底李先生便拒絕了黃校長。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李太在廣州美新處(註：美國新聞處)找了一份工作，因此如果李先生要來港，兩夫婦便要分開。但因為鄉師快要開學，而現職的舊相識又不肯到鄉師工作，唯有找我來。

許：1947 年楊慕琦離去，葛量洪來到又不給面子，要收回總督別墅。

馮：回溯二次大戰時，我從廣州走難，避居港澳，曾在香港中國黨政機關做事。因為當年廣州失陷，我便來到澳門居住，便過來香港做事。當時我教了三年書，覺得繼續教書不太妥當，剛好有機會中國政府，因為當時政府是黨政不分，廣東省主席吳鐵城來到香港設立辦事處。因為廣東找了軍人李漢魂當戰時的省主席，吳鐵城沒主席當便來了香港當國民黨的黨海外部部長，在香港設了一個很大的機構，辦了很多活動。其中一項活動就是向海外的華僑宣傳。

許：辦報。

馮：因為當時很多文化人、大學教授走來香港，中國黨政當局為了不讓中共收編，所以在機構組織了一個編審室，以收容一幫在內地來的文化人，大約有十多人。我有幸進入編審室，負責對海外的宣傳，又辦了一本《華僑先鋒》的月刊，以及一個海外通訊社，用以發新聞稿和一些短篇的文章供全世界的華僑報章機構參考。雖然已經不是同一個機構，但戰後回港我又繼續跟從這路線。

國民黨在香港辦了《國民日報》，是黨報來的，於是我便在《國民日報》掛單，但卻沒有工作做。當年編審室經費方面不成問題，要買什麼也行，要做什麼也行，有很大的自由度，因為大家都是文化人，各做各的事。

後來碰到黃校長，李老師又不來港。反正我打算在香港靜觀其變，如果中國政府有什麼不測而我又替他做事，便會再失業了，因此我便選擇替香港政府工作。我問黃校長教師的待遇如何，他提到羅富國和香港大學畢業生各自的待遇，但實際情況如何便要找教育司談，看看運氣如何。當我去找教育司時，他說沒有空，於是我便找尹視學官。尹視學官告訴我要任教中文、歷史、地理，因為當時黃校長告訴李先生就是要他教這些科目。黃校長還要我教教學心理，因為李先生不能教，但我卻可以。至於待遇方面，我和尹視學官說，我是中山大學畢業的，而我已經工作了 10 年，別理我曾從事什麼工作。總而言之，我不希望香港政府破例，我自己也不希望破例。因此最好根據香港政府的做法，承認我是大學畢業，以及有 10 年工作經驗，按照一貫的水平支薪。於是我有 300 底薪，另外加百分之五十津貼，總共是 450 元。但我當年在《國民日報》工作，連寫稿等收入，平常都有 600 元收入。

許：當年 450 元的收入已經很高的了。

馮：實際上也不是很高。比起國內的收入算是低，比起香港的收入就算是不錯的了。

許：當年一個校工的月薪只有 70 元。

馮：不過傾妥以後，教育司卻沒有空，於是我便拜託尹視學官和教育司相談，結果等了一個星期。其實教育司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當時真的找不到其他人，楊慕琦也很着急，因為是他主張辦這所學校。當年教育司的制度和現在不同，因為教育司是司級官員，每星期要向港督匯報一次。楊慕琦每逢見教育司，便會問他學校的情形如何，找到了新教師沒有？但財政司卻有問題，認為我的薪金太高。布政司人事處認為我既不是香港大學畢業，也不是在香港授業，怎能給這麼高的人工？

梁：你的個案要到布政司這麼高的層次？

馮：是布政司內的部門人事處。當時香港政府要聘請人員，必須經過這兩個部門：財政司願意批款，布政司人事處認為該人員合資格才行。因為兩方面都不贊成而要延誤。羅威爾每逢匯報給總督也是說要延誤。根據黃校長的說法，既

然有老師願意任教，黃校長和教育司也認為合適，便親自批准我的職位，Employed as a Temporary Staff，即是臨時教員，連 On Probation 也不是。臨時教員的意思是，只要找到其他教員，只要給我一個月通知或補發一個月薪水便可以。倘若我不喜歡做，也可以補一個月薪水給政府或一個月通知，便可以解約。

梁：當時已經是 1946 年末？

馮：我記得是 10 月 6 日，我帶著行李到上水金錢村。

梁：許先生是哪一屆的？

許：第二屆。

梁：當時的校舍還是粉嶺別墅？

馮：頭一年完結時仍是在港督別墅，到了 1947 年的年頭楊慕琦已經離任，接任的是葛量洪。以前香港政府的規矩，是新任港督和原任港督沒有機會接頭，原任的離去後，兩三個月的期間由輔政司署任，叫作護督，然後新總督才到任。許先生你或許記得吧？起初的時候是借羅富國的地方半年。

梁：當時的羅富國在哪？

許：般含道，即是余東旋別墅前面。

馮：現在即是戴麟趾康復中心旁邊。

許：我們一年級上學期時，還未入上水，要借羅富國的地方。老師們要由上水到香港島。同學們要走學，老師們要走教。

馮：有半年的日子是這樣的。即是鄉師辦到第二年，他們一年級要借羅富國的一個課室，非常不方便，亦產生很多問題。到了下學期才一併搬入上水別墅。

這裡產生一個問題，本來上水別墅是給港督休養而設，根本不適合當校舍，所以那時候要三位男同事住在主座樓上的一個房間。後來聘請了一位女同事，她便要 and 女同學同一間房住，這當然是很不方便的。

到了他們入學，為什麼要借羅富國呢？因為連找個課室的空間也沒有。地下

的一個大廳，Sitting Room 已經做了課室，港督的書房已經變成校長室，便已經沒有空間再開闢一個課室。那怎麼辦呢？一來不能繼續借人家的地方，因為極不方便。二來我們是需要住宿的，沒有宿位怎麼行呢。

原來由大馬路進港督別墅的小路的旁邊有數間小屋，是供港督的衛隊居住。另外還有一間車房，我們唯有把車房改為課室，衛隊室則做了男生宿舍。

梁：那時馬會的雙魚河有了沒有？

許：沒聽說過。

馮：有。

許：我們以車房當課室，以衛隊室當宿舍。車房沒有窗，很熱的。

馮：馬房應該是戰前已經存在的，因為我在別墅教書時，都已經去過這些馬房，但已經拆毀，大概是因為機構都已經停頓了。高爾夫球場都已經恢復了，但馬房仍未恢復。

許：我們住了半年，葛量洪來到便收回了不再續借，把我們趕走。

馮：到了辦到第二年，葛量洪已經上任，他沒有親自開口的，但 Lady Grantham 婉轉地告訴教育司，說葛量洪來到香港後公事很繁忙，需要休息一下。羅威爾聽到後便了解她的意思，於是鄉師便要找地方搬。

原來粉嶺車站旁邊有很多木屋，大約有十多二十座。這些木屋是戰時，在國內的日本軍隊佔領區有很多人破人亡，那些戰時兒童被慈善機構收容，大多是來自華南地區。到了後來，華南很多地方都被日本佔領，那些戰時兒童最安全就是搬來香港。於是由胡文虎出錢，香港政府出地，在粉嶺車站旁邊建了十多間大的木屋，叫作「戰時兒童保育會」。

許：即現在粉嶺裁判署。那時的木屋很漂亮。

馮：鄉師不能再在別墅辦下去，於是教育司和尹視學官便看中了那地方，立刻找人收回一部分木屋。

梁：那麼戰時兒童怎麼辦？

許：沒有了，那時已經空置了。

馮：因為已經打完仗。香港淪陷以後，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戰時兒童的下落了。那些地方很大，鄉師在那裡又辦了半年有多。雖然是木屋，打風下雨會漏水，但空間卻很夠。三個男教員也有一間房，女教員有一間房。一年級的課室和二年級的課室一樣大。收生依然是最多 25 人一屆，總共五十人。

第二年的學年末，由港督別墅遷往粉嶺木屋。

許：1947 年暑假前搬的。住了不夠一年。

馮：1946-47 的上半年是第一年，47-48 是第二年。即是到了 48 年底便離開港督別墅。在那裡待了一個學期。49 年初便出現了問題，因為國共內戰即將結束，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英國人認為香港的地位很危險，因為人民政府和解放軍可以隨時收回香港。於是英國便首先承認人民政府，因為承認以後才可以就香港問題商談。可是單靠商談也不行，也要有一定的實力，於是英國政府用軍艦把英兵運到香港。因為政府要找地方給軍人住，便看中了那些木屋。於是便向鄉師開刀，要立刻徵用木屋。

許：那時英軍已經來了，還曾經和他們住過一段時間。

馮：我們還未有地方搬，軍隊已經來了。尹視學官告訴我們，你們知道大兵就是大兵。所以所有的女同學也要停課回家，男同學和教員就可以留下來直至搬校。走了部分的女同學，課也不能上了，所以要停課。

許：我們旁邊有一家實驗小學，在粉嶺圍的祠堂，男同學要到粉嶺圍教實驗小學，叫做「鄉師附屬小學」。因為女生都走了，男生要負責教書。那條村是姓彭的。

馮：幸好，很快便找到屏山張園。

許：即是現在劉金龍，妙法寺那裡。

馮：那裡叫屏山虎地，鄉師結束以後業主便賣給妙法寺。

許：是不是張榮舉？

馮：因為屏山張園是一個農場別墅，有一座別墅的主樓，四周有很多地方。業主

張榮舉先生是中山，澳門人，在那裡經營農場別墅，但戰後都很少用了，因為已經殘舊了。張榮舉先生的太太是協恩中學的校長，張榮舉的弟弟是張榮冕（後來出任前葛師的校長），他是在牛津畢業學化學的，戰後在教育司署註冊部工作，與尹視學官相熟。鄉師要找地方搬遷，因為有這樣的關係，於是尹視學官便找來張榮舉。張榮舉的太太是協恩中學的校長，黃國芳的三名女兒也是在協恩中學讀書。因此便一拍即合。

許：我也住過一個月。

馮：因為到了學年尾才搬到屯門，所以他們只住了一個多月。

許：當時我們學生在粉嶺，每朝英軍會以軍車接我們去教書，因為他們拿了我們的校舍。那時一些主要科目，好像心理學那些，會在早上七時半的時份上課。上完主要課，我們便要到粉嶺的實驗小學教書。

馮：甚至我們要搬校，也是英軍以軍車和我們搬。

梁：這裡看到一個脈絡，自從英軍撤退以後，到現在成了粉嶺裁判署，也是政府的地方。

馮：到了英軍撤走以後，政府便收回了那地，拆卸了建築物，建成了現在新界北區裁判署。

梁：印象中在屯門也有一所鄉師同學會學校。

許：那不是同一個地方，同學會學校在山上面的，是後來建成的。

馮：那是鄉師同學會後來向政府申請撥地，由政府津貼，並由自己建校舍。他們畢業數年以後成立了鄉師畢業同學會，首先在元朗、荃灣、大埔三地辦夜校，然後在屯門新墟那裡向政府申請撥地。

許：夜校是免費的。

梁：在屯門建同學會學校是否因為鄉師由粉嶺搬到屯門後穩定下來有關嗎？

許：但鄉師始終於有正式的校舍。

馮：鄉師同學會學校一直也辦得不錯的，學校一直都是依靠青山道的鄉村子弟入

讀，但自從屯門新墟發展，建了很多公屋，後山的居民很多都入住公屋，如果再要回鄉師讀書便要橫過馬路，很不方便，而且公屋也有本身的學校，令學生越來越少。

後來辦不成，產生一個大問題。停校以後，需要把地交回香港政府，但我們要把校舍拆卸，那要花費很多金錢，而事實上鄉師同學會也沒有經費，如何能拆卸校舍呢？因此同學會內也產生了兩派意見，一派是希望盡量保持原校，另一派是主張交還，開了多次會議也沒有結果。結果同學們便找我來想辦法。那是 1997 年的事，英國要從香港撤退，港英政府對香港很多事務也淡出了，我們便利用了這機會。其次是譚萬鈞這教育界的後起之秀，又有很多公職，也有辦私校。

許：伯裘中學，人家叫他辦學奇才。

馮：新界很多鄉村學校辦不成便由他接手辦。鄉師同學會的地方偏僻，尤其在山坡上。但譚萬鈞卻有辦法：哪裡學生多，他便把學生調到這裡，所以不用另辦一家學校。

許：因為津貼只到中三，找不到中四學位的便要入讀私校，是有這樣的玄機。

馮：譚校長與鄉師同學會商量大家合作，即是私下把學校轉租給他（註：譚萬鈞）。其實是不可以私下轉租的，所以同學會中也分了兩派，尤其是曾在教育司中工作過的、當副視學官的，認為這樣私相授受是不行的；另一派認為總之可解決問題便行。結果他們找我來決定，我認為當時港英政府已經撤退，很多事也不會因循程序，其次譚萬鈞本身有公職，也辦了很多私校。所以我認為不論是否合理，只要譚校長想這樣做，便交由他辦，辦不來再謀辦法。結果就此解決同學會中的糾紛。

許：有段時間給吸毒者佔住。

馮：因為如果不辦學校，便要找人看守，但沒有人願意的，因為地點太僻靜，有些人會打破窗戶為非作歹。結果同學會和譚博士合作，有一段時間同學會收租金的收益不錯，令同學會也可以辦些活動。

許：他用回鄉師同學會的名稱。

馮：後來譚博士另謀發展，私立學校也走下坡，同學會便要找人另辦學校。幸好先例已開，香港政府也不理會，只要有人辦學便好。於是同學會象徵式收 1

元租金，有人在辦自然教育。總之有人在利用學校，看守着，負責維修，同學會的問題便解決了。

許：譚校長那時的安排也不會蝕錢，因為收租是按照學生的百分比收租的。

馮：言歸正傳，說回鄉師本身。鄉師曾經搬校三次，但只有粉嶺木屋的地方是足夠的，但建築物的質素卻很差，不足以蔽風雨。

梁：其實有沒有一些關於鄉師的照片？

馮：有，相片的話要向香港歷史博物館借。

許：都捐贈出來了。

馮：存在了 8 年的鄉師，除了最初一年開課頭一個月我不在之外，我一直都在任教。而我自己有一部古老相機，在鄉師的空閒時間也多，便利用古老相機拍了不少照，而我自己也有保留這些照片。但到了 12 年前，因為搬屋關係，而把書籍捐贈給葛師和香港大學，照片便整理好捐贈給香港歷史博物館，另外一些文件，好像黃校長在畢業典禮的報告，他自己保存了正本，我則保留了副本，後來捐贈給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

許：本來鄉師打算以楊慕琦命名，但他婉拒了，因認為當過俘虜，名譽不好。

梁：剛才提到鄉師有很多名稱。

馮：最初香港政府沒有給一個確切的中文名，到了港督別墅，我自己弄了一個牌匾，寫著「官立鄉村師範學校」。後來搬到張園，我和另一位農科的陳先生弄了兩個牌匾，一個是「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學院」，後來一個是「香港官立師範專科學校」。更改的原因是，香港政府並沒有規定正式的名字。正如羅富國也沒有中文名字，但它不用「官立」二字，因為已經用了一個總督的名字。但鄉師沒有正式校舍，因此不能用總督的名字，便要加「官立」二字以顯示其性質。第二，就是崇基學院李應林校長把嶺南（註：嶺南大學）由廣州搬來香港，辦了崇基學院。當時香港政府不容許它用學院的名稱，因為英國政府規定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家大學，香港政府亦要照辦。但崇基學院有美國的背景，而香港很多事務也要得到美國的支持，所以崇基堅持不易名。它反駁既然羅富國和鄉師也叫「學院」，為何崇基不能叫學院。港英政府也認為自己理虧，故此要求羅富國和鄉師由「師範學院」變為「師範專科學校」，以避免「學院」的稱謂。但崇基認為易名是其他學院的問題，它堅持不易名，

因此港英政府也沒它辦法。

梁：多謝你的時間，這次訪問給了我們很多啓發。